

編後語

作為中華民國的建國之年，一百年前的1912年已經載入了史冊。可以預計，2012年也必將載入未來的史冊。但關鍵的問題是，作為甚麼年？二十世紀的史家如何記錄2012年，端看中國人在這一年的政治作為。這一年，將成為國家—市場—社會走向良性合作與互動之年，甚至是自由、民主和憲政改革啟動之年，抑或是在改革的「深水區」邊緣不斷徘徊甚至倒退之年？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並不是幽靈，但也注定要在2012年再次在中國遊蕩。中國人多，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也就五花八門。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三篇文章，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在歷史學家張鳴看來，最有可能但也最為危險的一種回答就是「維持現狀」。所有那些在官僚新權威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式轉型時期攫取了巨額利益的人群，都極有可能積極地加入「維持會」，強烈要求將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模式化，使之成為貨真價實的「中國模式」。然而，維持官僚新權威主義的模式不變是不可能的。對於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來說，不改革的結局就是慢性潰敗，而改革不僅有可能讓近百年的「老黨」走向新生，還能讓中國走上新路。

如果說基於歷史的反思還能讓張鳴尋覓到走向未來的方向，那麼對現實的關注卻使政治學家任劍濤深感無奈。在2010年，政治體制改革的激情一度燃燒，但激情之火很快熄滅。在高調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年份中，「要改革不要革命」以極為弔詭的方式成為中國政治與知識精英心中的主旋律。整個社會確實在推動政改，但到頭來只能以「推而不動」來形容。中國上下都有不少人高呼勇闖改革的「深水區」，但是面對暗流洶湧的惡水，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有幸成為「免費搭車者」。

以研究當代中國上層政治見長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 在專訪中，特別關注兩個層面的制度化：一是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與權力轉移的制度化；二是政黨—國家與多元社會互動的制度化。無論哪一個層面的制度化，其核心都是構建新的遊戲規則，滋養新的價值規範，從而讓「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中國徹底終結。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這一政治變遷過程已經開始了，只不過變遷的路徑和方向並不明確。

本期所刊周質平的大作，借「幽默大師」林語堂的文字，也間接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基於中國的智慧，林語堂堅定地相信，在儒家人文理性主義和道家自由放任主義傳統深厚的中國，極權主義沒有扎根的土壤。然而，這並非實情。君不見，從「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再到孔子塑像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也就彈指一揮間。在當今中國，儒學不僅僅是「遊魂」，而且也是激勵眾多知識人試圖「超越自由民主」的思想源泉之一。